

〔宋〕柳開撰 李可風點校

柳開集

中華書局

〔宋〕柳 開 撰 李可風 點校

柳 開 集

中 華 書 局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柳開集/(宋)柳開撰;李可風點校. —北京:中華書局, 2015.11

ISBN 978-7-101-11209-2

I.柳… II.①柳…②李… III.①古典詩歌-詩集-中國-北宋②古典散文-散文集-中國-北宋 IV.I214.412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5)第 201628 號

責任編輯:許慶江

柳開集

[宋]柳開撰

李可風點校

*

中華書局出版發行

(北京市豐臺區太平橋西里 38 號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北京瑞古冠中印刷廠印刷

*

850×1168 毫米 1/32·9 1/4 印張·2 插頁·160 千字

2015 年 11 月第 1 版 2015 年 11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數:1-3000 冊 定價:32.00 元

ISBN 978-7-101-11209-2

點校說明

柳開是宋初首倡古文的作家，對北宋古文運動頗具影響，歐陽修嘗推宋朝古文自柳開始。

柳開（九四七——一〇〇〇），字仲塗，大名（今屬河北）人。曾祖仝，祖舜卿，皆不仕。父承翰，仕周爲南樂令，入宋後爲監察御史。柳開於太祖開寶六年（九七三）第進士。初仕任宋州司寇參軍，稍遷本州錄事參軍。太宗太平興國四年（九七九）擢太子右贊善大夫。歷知常州、潤州，拜監察御史。九年遷知貝州，加殿中侍御史。雍熙二年（九八五），坐與監軍忿爭，貶上蔡令。三年隨征幽薊，乞從邊軍效死，太宗憐之，復授殿中侍御史。後改崇儀使，知寧邊軍。淳化元年（九九〇）知全州，徙桂州，坐黥卒事，復貶滁州團練副使。真宗即位，加如京使，知環州，徙忻州刺史。咸平三年（一〇〇〇）徙滄州，道病首瘍，卒於并州，年五十有四。

開生於五代後晉末，長於宋初，出身於一個儒學素養相當深厚的家庭。幼時膽氣驚人，年十三時從父居南樂，曾揮劍逐盜，斷其二足指。就學之後，喜討論經義，學爲文章，

以韓愈、柳宗元爲宗尚，因名肩愈，字紹先。開以著述爲志，曾博採逸事，著爲《野史》，遂自號東郊野夫。年踰二十，欲補經籍之亡篇，又自號補亡先生。既而易名曰開，字仲塗，以開聖道之塗爲己任。開爲布衣時，急義疏財，豪爽自負，不顧小節，竭力交結俊傑之士，而不與俗儒往來。弱冠即文譽大著，與范杲齊名，世稱「柳范」。及第歷官之後，著述不衰。

宋初結束了晚唐五季近二百年的長期分裂割據的局面，社會秩序漸趨穩定，生產得到了一定的發展，社會經濟呈現較爲繁榮的景象。有宋王朝在完成了統一天下的武功之後，又務求於文治，有意提倡詩賦以粉飾太平，宮廷之內君臣唱和便成了風氣。致使以楊億、劉筠、錢惟演爲首的西崑派風靡宋初文壇。西崑派在以雕章麗句更迭唱和的同時，又喜作駢文，一味堆砌典故，追求偶儷精工的形式。由於他們政治地位很高，得以主盟文壇，於是這種華艷輕靡的文風便成爲一種時代的風尚，所謂「楊劉風采，聳動天下」，進一步發展了晚唐五代的駢麗文風。

幾乎與此同時，一股復古主義思潮也正在發展。唐代韓、柳之後，古文運動的高潮到晚唐、五代已處於低落之勢，但韓、柳古文運動的影響并未泯滅。宋初的一些作家如王禹偁、范仲淹諸人以嚴肅的態度，平淺質樸的語言說理記事，描摹自然，反映現實，寫作着與

當日文風截然相反的平實清醇的作品。宋初理學家石介對西崑派進行了嚴厲的批判，他說：「今楊億窮妍極態，綴風月，弄花草，淫巧侈儷，淫華纂組，剗鏤聖人之經，破碎聖人之言，離析聖人之意，蠹傷聖人之道……其爲怪大矣。」（《怪說》）他對楊億的批判可謂擊中要害。但他的文學思想處處將文學與聖道結爲一體，將《尚書》、《周易》、《三百篇》視爲文學的正統，將堯、舜、周、孔視爲文學家的典範，把文學納入道統的規範，嚴重地束縛了文學創作的發展。柳開在石介之前就提出了類似的主張，他主張文道合一，竭力鼓吹復古運動。文與道的關係早在荀子、揚雄、劉勰、文中子的作品裏已多有討論，到了韓愈，明確提出了道的系統，同時提出了文的系統，進而自命爲道統與文統的非我莫屬的繼承者。柳開極力推崇韓愈，正在於茲。柳開初名肩愈，字紹先，既而改名曰開，字仲塗，以爲「將開古聖賢之道于時也」；將開今人之耳目，使聰且明也；必欲開之爲其塗矣，使古今由于吾也。」蓋達于孔子者也（卷二《補亡先生傳》）。可見柳開不僅以斯文自任，更以斯道自任。他說：「吾之道，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道；吾之文，孔子、孟軻、揚雄、韓愈之文也。」（卷一《應責》）關於道與文的關係，他認爲道是主要的，是目的；文是次要的，是手段或工具；文的總目的就是明道。他喻道爲海，而文則是游海的工具，文必須與道相適應。用「今人之文」以明道，無異乎游海而乘驥。這種觀點在《上王學士第三書》中有更明確的闡述：

「文章爲道之筌也，筌可妄作乎？筌之不良，獲斯失矣。」又說：「文惡辭之華于理，不惡理之華于辭也。」理華于辭，不能辭華于理，既是他對於明道之文所制訂的標準，又是他對於西崑派形式主義文風的否定。《應責》一篇，集中闡述了關於古文的觀點，他說：

子之言，何謂爲古文？古文者，非在辭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在于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也。

所謂「古其理」，即闡明古人之道；所謂「高其意」，即是以聖賢之用心而爲，高出今人之意；所謂「隨言短長」，即是要求文章「非在辭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而要達到如韓愈所說的「氣盛則言之短長與聲之高下者皆宜」的程度；所謂「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要求古文家取法古人，發揮以言化於人的作用，爲「施教化于民」服務。柳開的這些主張在反對晚唐五季直至宋初以來頹靡文風方面確實起到了不可忽視的作用。范仲淹《尹師魯集序》曾說：「五代文體薄弱，皇朝柳仲塗起而麾之。」正是肯定了他在宋初古文運動再度興起中先驅者的地位。但是由于柳開固守儒家傳統之教，認爲今之世與古之世同，今之人與古之人同，觀點迂執保守，而他的古文創作成績難稱卓著，加之辭澀言苦之病，所以他并未使古文運動形成強盛聲勢。正如韓琦《尹洙墓表》所說：「文章自唐衰，歷五代，日淪淺俗，浸以大敝，本朝柳公仲塗始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振。」宋代古文運動直到歐陽修、尹洙、

石介、梅堯臣、蘇舜欽等登上文壇的時候，他們繼承并發展了柳開以來的復古主義傳統，才把詩文革新運動推向了高潮。

對於柳開其人其文的看法，歷代論者頗有歧異，或推崇備至，或貶抑過甚。如石介《過魏東郊詩》將柳開擬之爲孫、吳、伊、呂，稱他爲「斯文之宗主」，未免言之失當；而如王士禎《池北偶談》云：「予讀《河東集》，但覺苦澀，初無好處，豈能言之而不能行耶？」實爲已甚之詞耳。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認爲柳文體近艱澀，似乎已成定論。《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指出：「今第就其文而論，則宋朝變偶儷爲古文，實自開始，要其轉移風氣，於文格實爲有功，惟體近艱澀，是其所短耳。」又云：「王士禎《池北偶談》譏開能言而不能行，非過論也。」王士禎以爲初無好處，則已甚之詞也。」這一評價基本上是中肯的。但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其前後論者對柳文的批評幾乎都是着眼于形式與語言，而對其內容却絕少涉及。從形式上講，柳文確實一反偶儷之習，而以散體古文爲主，但是由于過分重質輕文，導致他的古文藝術技巧不高，又喜用語助詞，支離詰屈，確實令人難讀。至于柳文的內容，幾乎篇篇都是宣揚孔孟之道，處處體現道德禮樂，時時勸導「經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的儒家教化，內容狹窄而單調，絕少描摹自然、反映現實生活的作品。而且常常大言不慚地以當世之孔孟自居，認爲「聖人之道果在于我」。這恐怕是令人感到苦澀的

根本原因。所以李慈銘《荀學齋日記》認為柳文說理與自譽甚為可厭，不是沒有道理的。柳文亦有佳者，其《應責》一文，全面闡述了作者的復古主張，對於古文的解釋頗有見地，相當精辟，而語句也暢朗可誦。另如《贈劉植彈琴序》（卷十二）先言劉植彈琴而無知音者之悲，後言因劉植之悲而引起作者學為古文而無知己的自悲之情，寄慨遙深，可謂由衷之言。又如《海說》（卷一）認為百川之朝于海不能納而涸之，而是循環于天地之間，這是自然運化之道，說理妥順，頗為可喜。更有一些章表奏疏，抒寫自己效死疆場以報國安邊之壯志，表現了柳開慷慨激昂的豪傑之氣，頗能令人為之擊節。

宋初著名古文家柳開的文章，在宋代已經其門人張景彙編成書，宋元明清及近代均有著錄。

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卷十九別集類下載「《柳仲塗集》一卷」，并云：「集乃門人張景所編，歐公嘗推本朝古文自仲塗始。」陳振孫《直齋書錄解題》卷十七別集類中載「《柳仲塗集》十五卷」，並云：「門人張景為行狀及集序，本朝為古文自開始，然其體艱澀。」

元馬端臨《文獻通考》全襲《郡齋讀書志》和《直齋書錄解題》。

明焦竑《國史經籍志》卷五別集類亦著錄「《柳開集》十五卷」。《明史·藝文志補編·經籍志·文集》稱「《柳仲塗集》三冊，殘缺。」

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載「《河東集》十五卷附錄一卷，浙江鮑士恭家藏本。」《增訂四庫簡明目録標注》著錄較詳，云：「《河東集》十五卷附錄一卷，宋柳開撰，其門人張景編，附錄一卷，爲景所撰開行狀。」又云：「蘭溪柳渥川新刊本，抱經、竹汀皆有序。竹汀所見鈔本序後有小字一行云『胥山蠶妾沈彩書』。」

近代《書目答問》及其《補正》亦載《河東集》十五卷附錄一卷，有乾隆間蘭溪柳渥川校刻本，光緒間巴陵方功惠碧琳瑯館刻本（合穆修、尹洙二家爲《三宋人集》）等。

從上述著錄情況可知柳氏文集在宋代已有刻本，元明兩代可能無刻本，清代有兩種刻本，一爲乾隆乙卯刻本，一爲光緒丙辰刻本。柳開文集傳世之本均爲十五卷附錄一卷，在輾轉流傳過程中未大見歧異。柳氏文集之版本今知十有四種，實爲一個系統，茲分別略述于下。

（一）《河東先生集》十六卷，明吳氏叢書堂鈔本，三冊，現藏國家圖書館。此本前無張景序，卷首皆無目錄，卷數、序次、文字與諸本同。集凡十五卷，第十六卷爲附錄，即景所撰《柳公行狀》。此本爲明抄，乃今見最早之抄本，並成爲傳世諸刻本、抄本之祖本，校勘參考價值甚高。簡稱叢書堂本。

（二）《河東先生集》十六卷，上海涵芬樓影印《四部叢刊》所據舊抄本（原抄本今未

見）。此本卷數、序次、文字與叢書堂本同。前有張景序、分卷目錄。簡稱《四部叢刊》本。

(三)《河東先生集》何焯校本。據《柳河東集》乾隆乙卯刻本（詳後第四個本子）所附錄何焯題記及戴殿海跋，可知清代學者何焯曾以出自宋刻之抄本、明抄本互勘，使《柳開集》成爲一個完備之本。其原本今藏山東省圖書館，《中國古籍善本書目·集部》著錄之二一八一號。又見第二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推薦名單第〇三〇六九號。何氏校本在清代影響較大，《柳開集》傳世之本以其爲底本形成了一個完整的系統，何校本既承宋刻、明抄而來，又爲不少清本所祖，起到了承先啓後的作用。簡稱何校本。

(四)《柳河東集》十五卷，乾隆乙卯年開雕（蘭溪文印堂藏版），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此本前有盧文弨（抱經）序，張景序，後附錄張景所撰《柳公行狀》一卷，何焯題記二則及戴殿海《跋河東先生集後》。簡稱乾隆本。

從何氏題記和戴跋中可知，何氏校本較諸抄本爲最精，而乾隆乙卯本係依據何校本開雕。《柳開集》自北宋刻本至清乾隆乙卯刻本之前數百年間向未刊行，因此可以認爲乾隆乙卯刻本是現存僅見的最早刻本。

(五)《三宋人集》（三種四十六卷），光緒辛巳孟秋碧琳瑯館校刊，內有《河東先生集》十五卷附錄一卷，光緒丙辰孟冬刊於韓江官署，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此光緒丙辰本與

乾隆乙卯本之行格字體幾無差別，唯有個別字之筆劃稍顯不同，顯係據乾隆乙卯本翻刻。又，光緒本每卷之末均標「東陵方功惠重校刊」，而第一第二兩卷之末仍標「蘭溪裔孫柳景昂校字」，與乾隆本同，此乃翻刻乾隆本又一佐證。此本與乾隆本文字差異絕少，只有七處不同，多爲光緒本誤刻所致，但亦有對乾隆本改正之處，如「與堯舜比肩」之「肩」字，乾隆本誤爲「扇」，此本正之（卷十，八頁）。此本較之乾隆本又增錄了《四庫全書總目提要》「《河東集》十五卷附錄一卷」條和《宋史》柳開本傳，置於集前。簡稱光緒本。

（六）《河東先生文集》十六卷，清抄本，四冊，周星詒、柯逢時跋，周李惠跋并錄何焯題記。現藏國家圖書館。此本卷數、序次、文字與諸本同，半葉十行，行十八字，楷書極精。張景集序後有一行字云：「胥山蠶妾沈彩書」，此與竹汀（錢大昕）所見本同，并有「胥山蠶妾」、「沈彩之印」，卷一下有「某谷」、「春雨樓校藏書籍」二印。書前有周氏、柯氏二跋。此本雖非何焯手校原本，但亦出自何本，當與何本極近，其校勘參考價值亦高。簡稱周柯本。

（七）《河東先生集》十五卷行狀一卷，清抄本，六冊，現藏國家圖書館。此本封面有「咸豐八年六月一日出滂喜園」字樣。前有張景序，每卷有目錄。半葉十三行，行廿四、廿五字不等，字楷書不嚴謹。此本諱字不嚴格，如「玄」有缺末筆者，亦有不缺末筆者，「然」字多有缺四點者。抄寫疏忽較多，「焉」誤爲「馬」，「古」誤爲「舌」等等。此本可暫稱「滂

喜園」本。

(八)《河東先生集》十五卷行狀一卷，清抄本，彭元瑞校，二冊，現藏國家圖書館。此本前有張景序，每卷有目錄，卷數、序次、文字與諸本同。此本字損處較多，卷五《與范員外書》「先者仁以存其誠，義有制其體，務在」以下缺，並失去《答梁拾遺改名書》。彭氏校改之處可見，如卷六《上王太保書》：「肯北而退乎」，彭改「北」爲「此」；「虜使聞者南入深冀」，彭改「聞」爲「間」。又如《答臧丙第三書》「若君子織其口而默其言」，彭改「織」爲「緘」等等。此本與乾隆刻本諱字同。簡稱彭本。

(九)《河東先生集》十五卷行狀一卷，清道光十一年劉氏味經書屋抄本，二冊，現藏國家圖書館。此本前有黃裳題記一則。此本半葉十一行，行二十字，字楷書頗精。與諸本同。黃校改處僅及卷一《默書》、《名系》、《字說》三篇，如「悅仇緩冤」，黃改「緩」爲「綏」，《默書》「其難也久」，黃改「久」爲「人」，《字說》「不知何所據。簡稱味經書屋本。

(十)《河東先生集》十五卷行狀一卷，清讀古樓抄本，二冊，現藏國家圖書館。此本前有張景序，卷有目錄，卷數、序次、文字與諸本同。書後有抄者所錄何焯題記一則（康熙五十年辛卯春日），又有抄者題記，云：「辛卯歲八月中秋林村居士復以靛筆改正五十餘字。」此本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字體頗精，不見校改之迹，當抄於校改之後。因其錄有何

焯題記一則，文字與周星詒、柯逢時跋本差別很少，疑其亦出自何氏手校本，不過又經他人校改五十餘字，如卷八《與河北都轉運使樊諫議書》「開逐曹帥饋伐燕」，諸本「饋」下皆空一字，獨此本補爲「糧」字。簡稱讀古樓本。

以上諸本，祖承宋刻明抄，中經何焯手校，文字完備，廣爲流傳於清代乾嘉之後。

(十一)四庫全書本。《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載《河東集》十五卷，附錄一卷，宋柳開撰。《增訂四庫簡明目錄》著錄較詳：「《河東集》十五卷，附錄一卷，宋柳開撰，其門人張景編，附錄一卷，爲景所撰開行狀。蘭溪柳渥川新刊本。抱經、竹汀皆有序。竹汀所見抄本，序後有小字一行云『胥山蠶妾沈彩書』。韓氏有影宋本。《續錄》又稱：八千卷樓有舊抄本二部，四部叢刊本。」四庫全書本《河東集》之底本今藏浙江省圖書館，見第三批《國家珍貴古籍名錄》推薦名單。

(十二)《河東柳仲塗先生文集》十六卷，清抄本，四冊，現藏國家圖書館。此本卷數、序次、文字與諸本同。前有分卷目錄，無張景序，全書編有統一頁數，自一至百十七，百十七後尚有半葉。卷前有「南宮邢氏珍藏善本」、「歛鮑氏知不足齋藏書」等印，知不足齋主人即鮑士恭之父鮑廷博，故此本可能即《四庫全書總目》「柳河東集」下所注之鮑士恭家藏本。此本空缺少於叢書堂本而多於其他諸抄本。此本半葉十三行，行廿六字，字體亦精。

卷十六《柳公行狀》「建」字以下缺，與叢書堂本同，顯係自其而出。簡稱知不足齋本。

(十三)《河東先生柳仲塗文集》十五卷附錄一卷，六冊，孫文川用呂留良抄本校並跋，現藏北京大學圖書館。此本前有分卷目錄，無張景序，半葉九行，行二十字，字體不嚴整，信如孫氏所言，脫訛較多，如《東郊野夫傳》有一處竟脫去四百餘字，卷十六《柳公行狀》「建」字以下缺，與(十二)同。簡稱孫本。

(十四)陸心源跋曙戒軒鈔本，收入綫裝書局景印「宋元珍本叢刊」。

以上三個本子與前十種版本仍屬一個系統，均係襲明叢書堂本而來，唯其間無見何校本之痕迹。

此次點校，以今所見最早之刻本乾隆乙卯本爲底本，以明叢書堂本、四庫全書本、《四部叢刊》影印本爲通校本，以周星詒、柯逢時校跋本，彭元瑞校本等爲參校本，並參照與柳開個別篇章有關的書籍，如《史記》、《宋史》、《全唐詩》等互爲勘正。能够斷定的訛誤，則改正原文並出校說明；凡有參考價值而兩可者均爲出異文校記；凡屬明顯的版刻錯訛，則逕改不出校。另外，將柳開生平傳記，柳開文集之書目著錄，版本序跋等資料彙集附錄於後，以資閱讀研究之便。

柳氏文集在流傳過程中，有《河東集》、《柳仲塗集》、《柳開集》三種名稱，爲不使與唐

柳宗元《河東集》相混淆，今名之爲《柳開集》。

在此次點校過程中承蒙北京大學周祖謨教授、孫欽善教授和中華書局編輯部同志給予關心和指導，不然，作爲初學的點校者是無法完成這一工作的。因點校者學識所限，舛誤之處在所難免，更望讀者不吝匡謬。

李可風

一九八四年七月於燕園

序

新雕柳仲塗先生河東集序

盧文弨

聖賢之所以垂世立教者，莫著於六經。後人誦法六經，闡發聖賢之微言大義，以啟迪夫後知後覺者，於是著而爲文，此文之所以爲古而始足重於天下。然則所謂古文者，非古於辭之謂也，言古人之言，此文之所以古矣。宋興，承五季經學廢絕，文章骯髒弊極之後，有能卓然特立，不爲風氣所囿，奮力直追古之作者。以求其所以立言之旨，而一本之於經術，示天下以正路之當遵，而使後來之聞風而興起者益張皇而揚厲之。天下事，作始也難，承藉也易。人但見後來之闕肆彪炳，浩博無涯涘，而因有狹小前人之見，以爲氣鬱輻不宣通，辭艱澀不流暢，幾使不得與於立言之數。噫！此豈可謂善於知人論世者哉？吾於宋初柳仲塗先生之文，而歎其能近於道也。其言曰：「古文者，非在辭澀言苦，使人難讀誦之也，在於古其理，高其意，隨言短長，應變作制，同古人之行事，是謂古文。吾若